

让国际贸易 走上正轨

美国肯塔基州坎贝尔斯堡市附近，一列满载汽车的火车。

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

通过国际贸易 收益再分配政 策可以提升生 产力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减速，发达经济体明显减少了对国际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支持，美国尤其如此。尽管一些国家对贸易自由化的抵制由来已久，但二战以来都未能阻止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已给发达经济体带来增长，并且促进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趋同。

一直以来，反对国际贸易只是少数人的观点，因为大多数人都能从中获益，然而在今天，这种声音似乎越来越多。

虽然国际贸易能让国家更有效地运用资源，但高效率产生的成果并不能在国民中得到公平分配，因此有些人遭受了损害。其结果就可能扩大收入不平衡，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过去 25 年来，由于国际贸易增长、技术进步、政治改革，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国际贸易总体上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大多数政府并不能确保经济增长成果（包括国际贸易带来的部分）能够被广泛地分享。甚至在有些地方，总体收入增长乏力已使民众极度失望，从而引发动荡。

尽管国际贸易收益一直以来都不能被公平分享，但最近几年却愈发严重。而在当今经济低增长的大环境下，贸易收益显得更加重要。政府必须通过更加公平的再分配政策，来保护及扩大国际贸易收益。这也可以使经济体更能经受来自全球化以外的其他各种市场力量的考验。

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

二战以来，关税及配额等贸易壁垒逐步减少。而且，凡是贸易壁垒减少的地方，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都得到了改善，因为它们可以用较低价格取得大量的各种商品。更重要的是，贸易也对生产力有很强的积极促进作用。生产力即运用全球资源制造经济产品的效率。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因此获得这些国际贸易收益尤其重要。

国际贸易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原因在于比较优势，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两个世纪前的解释那样。他指出，假如英



国和葡萄牙都能生产纺织品和葡萄酒，若具有较低葡萄酒国内机会成本的国家专门生产葡萄酒，另一个国家则专门生产纺织品，其结果是两种产品都能达到最大产量。这两个贸易伙伴都能因此从专业分工中获益。而且，即使某国同时生产两种产品的效率都高于另一国，即生产两种产品都有绝对的生产力优势，这种专业分工仍然有效。虽然国际贸易总能提高各参与国家的生产力，但当今的公开讨论中却经常忽略这一点。

虽然实证研究也支持了李嘉图关于国际贸易提高生产力的基本洞见。但是，贸易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有利作用远远超出于此。因为，由于国际贸易，来自国外的竞争迫使国内生产者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而且，国际贸易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半成品，让企业能以较低成本生产产品。最后，出口商能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学到更先进的技术，被迫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来争夺顾客（例如，Dabla-Norris 和 Duval，2016）。

在李嘉图的时代，国际贸易是一项崭新的先进技术，打开大门的所有国家都能同时获益，所有人也都能平等受益。

有些时候，国际贸易的确如此。但是，国际贸易的众多积极面并不能解释有些人极力反对它的原因。

其实，国际贸易的两个主要因素可以解释某些人反对它的原因。第一，自由贸易导致部分行业萎缩，需要重新配置经济资源，因此付出了短期代价。比如，由于纺织行业紧缩，其工人可能因无法很快学会葡萄酒酿造技术，而不能转向葡萄酒行业再就业。在现实世界中，这类代价与低效率可能会持续很久，有些甚至会变得很严重，让这些工人感到国际贸易能够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很抽象，并且与自己无关。

第二，即使没有就业调整的问题，国际贸易仍然会加剧国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些人的收入绝对值甚至会降低。因此，尽管国家整体上提高了生产力和收入，但有些人可能受益更大，而有些人却完全是遭受损失。损失者因此会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见专栏）。

而且，这些所谓的再分配效应不仅体现在贸易全球化进程中，也体现在技术进步上，因为技术进步会让某些行业比其他行业获益更多。假如技术进步让纺织业的非熟练和熟练工人产出相同，而葡萄酒酿造技术却没有改善，其带来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因为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是相似的，所以技术进步造成的收入再分配与国际贸易类似，这也就不奇怪了。然而，尽管有不少人对国际贸易心存疑虑，但几乎没有人对更先进的生产力表示反对。

要研究贸易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分离出其他因素（比如，技术变化）对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影响。而且，贸易全球化与技术进步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作用——贸易全球化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国际贸易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让研究更加复杂。

为什么有些人会因国际贸易而遭受损失？

国际贸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某些人造成损失，但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斯托尔帕（Wolfgang Stolper）与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其中最简单且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理论解释。他们假设葡萄酒和纺织生产都雇佣熟练与非熟练工人，但葡萄酒行业需要更熟练的酿酒工人，而纺织行业雇佣的大部分都是非熟练工人。如果纺织行业由于国际贸易而紧缩，新失业的非熟练工人就不得不在日益扩张的葡萄酒行业寻找工作，尽管葡萄酒行业在扩张，但该行业需要的非熟练工人数量相对较少。因此，新失业的非熟练工人要想在葡萄酒行业再就业，就必须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因而上升，因此葡萄酒行业的所有企业都有动机用非熟练工人来取代熟练工人——例如，通过让少数熟练工人来带领非熟练工人团队。

国家之间与国内的收入不平等

最近几十年来，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已有所下降，但多国的国内收入不平等现象却有所上升，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全球趋同，但同时也改变了其国内的生产方式与收入分配机制。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亚洲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显著降低，尤其是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达到了发达经济体水平，还有最近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印度的人均GDP从1991年的553美元（按2010年美元计）上升到2015年的1806美元；同时期，中国的增长更可观，从1991年的783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6416美元。鉴于两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和印度的成功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世界各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但是，缓慢增长的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并没有很快减少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其中不发达国家的贫困率已显著降低。

上述收入趋同和减贫方面取得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际贸易和投资，即便不能归功于自由贸易政策，也要归功于外向型生产制造。

但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发展成果并不总是能够很平等地分配。大体说来，亚洲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恶化，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是巴西）收入不平等在降低，但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仍然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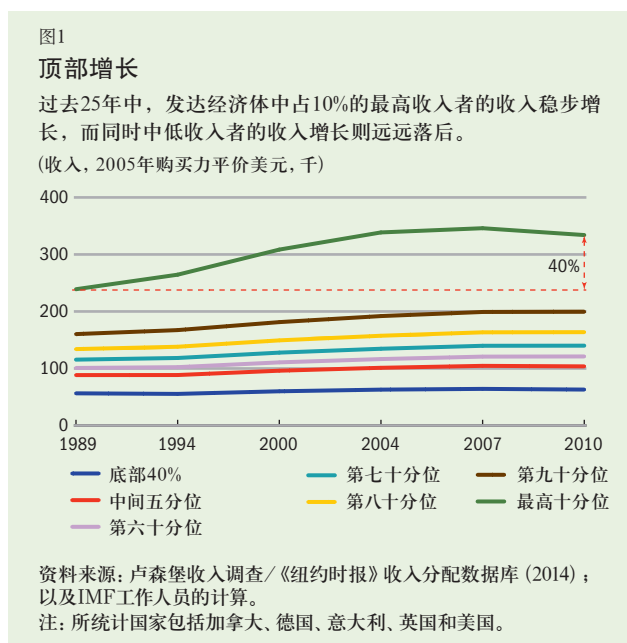
同时，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最近经济增长也在减速，从而导致家庭长期收入增长较为缓慢，但高收入者除外（见图1）。虽然经济减速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美国的例子说明，由于二战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其包容性有所降低。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人均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3657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扣除通胀因素）的结果与1989年大致相同。作为对照，20世纪80年代末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20世纪50年代早期几乎增长了一倍。而经过在一段时间快速经济增长且广泛分享增长成果之后，过去25年来至少有一半的美国家庭未能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此后，在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突然上升了5.2%，但其持续性仍有待观察）。

在很大程度上，收入不平等的降低反映了特定国家政策的作用，比如累进所得税、高级管理人员收入限制、经济金融化。但贸易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仍然是可能的影响因素，因此量化其各自的作用就非常重要。如前所述，贸易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紧密关联。一方面，技术创新（如信息与通信技术）让更多的国际贸易成为可能，例如，银行与保险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或者面临着进口商品的挑战，企业可能会创新升级其生产流程。而且，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促使技术最佳实践跨境传播，技术最佳实践本身也影响了比较优势的模式。也就是说，贸易全球化本身有助于使技术成为国际经济因子。

全球性变化

过去25年间，虽然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但毫无疑问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在改变全球的生产和收入分配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几件大事的发生共同促成了全球经济的变化。其中，前苏联剧变让其东欧和亚洲加盟国能够实行市场经济，开发国际贸易与投资。



与此同时，已从1978年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中国加快了发展步伐，尤其是准许更多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并降低了进出口限制。此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对国际贸易更加开放，其中拉丁美洲国家摆脱了将近十年债务缠身的低经济增长，印度于1991年实施了大范围的改革。另外，很多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其他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也在提高，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出口。

这些进展在当时广受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们创造的全球贸易体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包容性。这不仅促进了全球数十亿人的经济自由，改善了其中某些地方的政治环境，也通过提高全球收入与消费、增加投资、促进创新来推动经济更快的增长。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加速，但由于某些人比别人更能干，更能抓住新机遇而从中获益，因此也导致了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尽管如此，中国和印度等国首次出现了明显的中等收入阶层。

但是，这些全球性变化对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也很明显，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工人受到了急剧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给冲击，其中更多的是低技能工人。例如，2000年前后，中国、印度、前苏联国家给世界经济贡献了将近15亿劳动力，让全球劳动力数量翻倍（Freeman, 2007）。而且，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推论表明，全球劳动力-资本这一比率的增长会降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报酬-资本收益这一比率。这也可能是北美、西欧、日本等国工资中位数长期增长乏力及其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下降的部分原因。而且，与此同时，工会运动衰落，企业向海外低工资地区转移生产基地意愿上升，也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因此，按照斯托尔帕-萨缪尔森的逻辑，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工人相对工资会上升，而发达国家的高技能人才将受益，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会降低，而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会加剧。但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高技能和低技能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一直都在扩大。而且，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相矛盾的还有，同一行业内技能溢价也有扩大的趋势，同时，没有证据显示因为低技能人员相对工资下降，发达经济体各行业因而增加了其雇佣量。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截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技能溢价的全球演进主要是由于有利于高技能人才的技术的进步——例如，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这是另一种产生全球性影响的变化，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迅速发展，并且赢得了广泛赞誉。但在这种情况下，扩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由于行业内的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能够找到技能更高的劳动力，国际贸易因此扩大了对技能的需求。国际贸易的另一种可能的影响方式是外包：将低技能工作从发达经济体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可以提高双方的技能溢价（Feenstra和Hanson, 1996）。

自21世纪初以来，贸易全球化已加快步伐，其中包括中国全面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大教育投入，使更多常规制造业与常规服务业转移至海外成为可能；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迅速增长，在这方面中国尤为突出。在发达经济体，中等技能工作已消失，出现所谓的“工作两极化”现象。尽管某些工作两极化是由于国际贸易和制造业向海外转移造成的，但也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比如常规工作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Goos、Manning和Salomons, 2014)。

政府应采取更多的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政策，让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得到分享。

仅在最近，才有足够的详细数据可信地证明，中国商品进口以及海外代工对发达经济体的进口竞争型行业、当地劳动力市场、工资等产生长期负面影响。一直以来，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生产力提高较快，其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已经逐步减少。但是，在21世纪头十年美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大幅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在海外(包括中国)投资建厂生产产品返销美国(见图2)。

如果美国制造业替换下来的工人能够全部再就业，他们就必须接受大幅下降的工资(Autor、Dorn和Hanson, 2016; Ebenstein、Harrison和McMillan, 即将发表)。而且，在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很多国家，因进口产品竞争而失业的工人要遭受长期工资损失和失业的困扰。虽然这也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最近有加剧的倾向，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日益老龄化，以及与中国出口快速增长有关的大范围失调。

从“安全网”到“蹦床”

可见，上述全球性变化创造了新的全球经济，虽然未来似乎不太可能出现与其同等规模的更多冲击，但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后续影响仍然不小，类似的失调肯定还会出现，尽管规模较小。在新形势下，政府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保护主义政策，同时维护并扩大国际贸易的收益呢？

在其1989年的报告《就业调整走向成功》(Adjusting to Win)中，加拿大就业调整专家顾问委员会对比了“安全网”政策与“蹦床”政策——前者是指通过失业救济等措施给失业者提供保障，后者是给失业者提供再就业“跳板”(Trebilcock, 2014)。尽管两者都很重要，但“蹦床”政策包括就业咨询服务与再就业培训等积极措施，在经济冲击发生时可以帮助失业者更快调整，以减少长期失业，防止技能贬值和就业能力下降。虽然在很多发达经济体已

经有此类项目，但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让所有人都能从最佳实践中受益。

一方面，“蹦床”项目不仅对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变化有帮助，对各种变化都有帮助，而且也有必要。虽然很难识别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特定失业，但无论再就业是由于国际贸易还是其他经济变化引起的，政府介入以推动失业者再就业都值得关注。同时，帮助失业者调整的政策还包括加大教育投入(以创造更高适应能力的劳动力)、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加大医疗投资、增加住房供给、降低创业门槛、提供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等。这些政策还有促进经济增长的额外收益。

另一方面，“安全网”项目也有必要。因为开放程度更高的经济体可能要经受更多外来冲击，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安全网”。例如，政府可以给再就业后工资降低的工人提供更多的工资保险(Kletzer和Litan, 2001)，并对雇佣失业工人的企业提供工资补贴。此外，类似美国所得收入抵免的政策值得推广，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可以鼓励失业者再就业。政府还应该采取更多的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政策，让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得到更广泛地分享。

由于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了国际税收竞争，没有畸高的所得税或累退的消费税，政府难以负担社会“安全网”及再就业工程。因此，需要开展国际反避税协调行动，防止资本所有者从全球化收益中收获过大。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处理收入不平等问题，那么对国际贸易的政治支持会进一步减弱。

没有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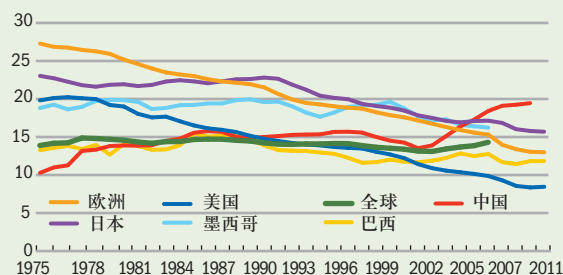
虽然贸易全球化给所有人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收益，但是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对受到贸易全球化冲击的人提供帮助，这些潜在的经济收益并不一定能实现。自20世纪90

图2

交换空间

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就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原因在于制造业工作已转移到新兴经济体，以及技术进步造成人员过剩。

(制造业，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EU-KLEMS; EUSTAT; GGDC 10-Sector; ILOSTAT;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OECD; and RIETI CIP.

年代初以来，全球性变化影响深远，外加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持续的放缓，这已经让很多人和团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对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反对浪潮日渐高涨。

但是，国际贸易与贸易政策并不是这些变化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它们也不是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技术进步以及特定国家的发展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没有分摊经济开放风险的明确政策框架，二战结束以来所秉持的推动国际贸易的政治共识可能会烟消云散；政府要确保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培养受到良好教育、适应能力强的劳动力；做好职位匹配；改善金融市场功能；采取直接措施处理收入不平等问题。此外，处理一系列其他经济变化也需要同样的政策框架，因为与国际贸易一样，这些经济变化也可能对有些人造成损害，所以需要在经济体内部进行调节。

国际贸易是唯一特殊的，这只是一种错觉，即认为当外部世界引起麻烦时，政府能够闭关锁国，以解决问题。但在 21 世纪，国家之间必须相互依存，别无选择。■

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是 IMF 的经济顾问、IMF 研究部主任。

参考文献：

Autor, David H.,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on, 2016,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2190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Dabla-Norris, Era, and Romain Duval, 2016, “How Lowering Trade Barriers Can Revive Global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iMFDirect, posted June 20.

Ebenstein, Avraham, Ann Harrison, and Margaret McMillan, forthcoming, “Why Are American Workers Getting Poorer? China, Trade, and Offshoring,” in *The Factory-Free Economy*, ed. by Lionel Fontagné and Ann Harri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enstra, Robert C., and Gordon H. Hanson, 1996, “Globalization, 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2, pp. 240–45.

Freeman, Richard B., “The Great Doubl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Global Labor Market,” 2007, in *Ending Poverty in America: How to Restore the American Dream*, ed. by John Edwards, Marion Crain, and Arne L. Kalleberg (New York: New Press).

Goos, Maarten, Alan Manning, and Anna Salomons, 2014, “Explaining Job Polarization: Routine-Biased Technical Change and Offsho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4, No. 8, pp. 2509–26.

Kletzer, Lori G., and Robert E. Litan, 2001, “A Prescription to Relieve Worker Anxiety,” *Policy Brief 73*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Trebilcock, Michael J., 2014, *Dealing with Loser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Transi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12-MONTH MPA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AT COLUMBIA

Designed for mid-career professionals, with tracks in

-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 Centr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 Global Energy Management and Policy

Application Deadline for 2017–2018: January 5, 2017

- A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Faculty of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macroprudential policymak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Contact us at pepm@sipa.columbia.edu | 212-854-6982 | sipa.columbia.edu/pepm